

父亲和我

路玉红

偶然间,我与朋友聊到了父母,我的眼眶瞬间湿润。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是家里的第四个女孩,有三个姐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我的到来会让大多数父母失望,但我父母并不这样。

我小时候,父亲整天忙于农活,每天早出晚归。父亲为人和善又有文化,他一直做着相对轻松的农活,像当计工员、看护场院里的花生以及地里的瓜果蔬菜,这都是好差事。他干啥都尽职尽责,从不贪公家一点便宜。

我上小学时,我家在村的东南角,学校在西北角。放学路上,我经常边走边玩,很久才到家,难免遭到母亲的训斥,但父亲总是给我找理由。

我三年级时需要上晚自习,得带煤油灯照明,父亲每次都给我收拾得亮亮的。晚自习回到家常常是九点半左右,我冻得浑身发冷,父亲就给我洗脚,一边洗一边揉搓。现在,我时常想起父亲坐在矮凳子上给我洗脚,母亲坐在高凳子上做鞋的情形。

我读小学时成绩不错,尽管当时物质匮乏,父母却舍得给我买学习用品,外人感到不可思议,可父亲总是呵呵一笑。

小学毕业后,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初中,父母十分高兴。

初中一晃就过去了,中专、高中我都没考上,父母让我选择了复读。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当时驮了一大袋绿豆到收购点,换了一百多元给我交了复读费,他没有责备我,只有满满的鼓励和叮咛。再次考试时,我没能如愿考上中专,得知分数的我沮丧不堪,父亲

却再次操持起复读费用。邻居劝说父亲,父亲只是笑而不语。

承载着父母的希望,我终于考上了中专。四年的中专生活很快过去了,我毕业后留在聊城上班。

工作之后,我每周都回家。有一次周六下午,我回到家,母亲在做饭,我便问父亲去哪了,母亲说去栽地瓜了。我出去找父亲,走到地里后我让父亲回家。父亲坚持栽完再回,我就帮着埋土。活干完后天已经全黑了,地里一个人也没了,本来就胆小的我赶忙喊着父亲回家。我推着车,父亲在车上坐着,我们一起回了家。

我们几个长大后,无论谁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路上都不让父亲拿工具,连最小的弟弟也是如此。吃饭时,我们也总在父亲喝完第一碗后帮他盛第二碗,好吃的也第一个给父亲吃。

后来,我结婚生子加之上班,便是一个月回去一次了,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跟父亲并没太多交流。

1996年正月初三,我本该回娘家,可我对象被电焊闪了眼,无法跟我一起回去。那时没有电话,交通也不方便,父母不知什么情况就胡思乱想。下午一点左右,我姐夫和弟弟到了我家,得知原因才放心回去向父母说清。

随着年龄的递增,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一次因脑梗被送往医院救治,病情稍微好转便喊我的名字。

还来不及得及回报,父亲便卧床不起了,一个多月后,他就过世了。我哭得昏天黑地,却也不能阻止父亲化作一缕青烟。

父亲入党记

刘小兵

一天晚上回到家,我看到父亲摊开信纸,一笔一画地在橘黄色的灯光下写着什么。

我上前一看,只见洁白的信纸上赫然写着“思想汇报”四个大字。我问父亲:“你不是年初就入了党吗,还写这些干嘛?”父亲停下笔,严肃地说:“只有思想上入了党,才是一名好党员,我把想法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也是应该的。再说,建党节马上就要到了,在这么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向党组织吐露自己的心声,多么有意义呀!”听完老爸的话,我不由得朝他伸出了大拇指。我知道父亲对待入党这个问题,从来就没含糊过。

父亲出身苦。他两岁那年,我的爷爷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信。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里,奶奶又狠心地撇下父亲,只身一人离家出走,嫁给了深山里一个木匠。此后,父亲与我的姑妈相依为命,饱尝人间艰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父亲和姑妈送进了学校,父亲初中毕业后,当了一名会计。后来,党和政府又把父亲送进了军营锻炼。

入伍后的父亲勤学苦练,很快成了训练场上的标兵,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退伍回到地方,上级有关部门把父亲安排进了一家企业。退伍不褪色,父亲把军人的优良作风带到了新岗位上。脏活累活抢着干,他从不计较个人

得失,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许多人退休后,都把家安在了大城市。父亲丝毫不恋城里的舒适生活,毅然回到老家,在乡下承包了二十亩沼泽地,带领乡亲们一起搞起了水产养殖。几经波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养殖规模不断扩大。三年时间,父亲不仅还清了所有贷款,还创收20余万元。父亲致富后,始终没有忘记各级党组织对他的关怀和培养。前年,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父亲的入党申请一直没有被批准。党小组长找父亲谈话,勉励父亲不要因此背上思想包袱。父亲淡然一笑:“请组织放心,我一定会对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父亲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去年底,村里考虑到他年纪大了,就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希望他能在家安心静养。但父亲坐不住,隔三差五往村里的养殖场跑,帮助大伙解决养殖中碰到的各种难题。在父亲的带动下,村子里的不少村民通过实干、巧干,日子越过越红火。看着乡亲们都自信满满地奔走在小康路上,父亲的心里比喝了蜜还甜。此时,他入党的愿望更强烈了。

父亲的坚持终于有了收获。今年一开春,鉴于父亲在工作中的良好表现,上级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终于批准了父亲的入党申请,父亲脸上乐开了花。

编者按 父爱如高山,厚重无言;父爱如大海,宽广无垠;父爱如春雨,细润无声……世间父爱千万种,有相同,又不尽相同,从古至今皆如此。6月18日是今年的父亲节,本版刊发几篇关于父亲的文章。让我们透过作者的笔尖,在字里行间品味浓浓父爱。

硬汉父亲

许金燕

我的父亲许兴胜一生为人正直,敢于同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人作斗争。在我们三兄弟眼里,父亲就是一位响当当的硬汉。

父亲高小毕业,身怀一项绝活儿,就是双手能把算盘打得啪啪响,账算得一分不差。因此,父亲在村委会连干了三届会计。记得一天深夜,村子里一位管事的干部提着高档烟酒来到我家,暗示父亲在一笔账上动点“手脚”。父亲知其来意后,拍案而起,严词拒绝,并把送来的高档烟酒甩出了门外,来人灰溜溜地走了。

父亲提高嗓音的斥责声以及把东西甩出门外的响声惊醒了睡梦中的母亲和我们三兄弟,我们都替父亲捏一把汗。后来证明,我们的担忧不是多余的。那位村干部从此怀恨在心,在工作上经常给父亲使绊子。父亲心中有数,对工作更加上心,从未出现过纰漏。等到任期届满,那位村干部被全体村民选下去了。

父亲的腿部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一遇阴雨天,风湿病就会发作,疼得他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母亲和我们三兄弟心里都清楚父亲的风湿病是怎么

得的。1979年刚入冬,母亲生下小弟,当时家里条件十分拮据,根本没有余钱买营养品,连一日三餐也吃不饱,母亲和小弟的身子极其虚弱。一天,父亲找出一个空编织袋子,一声不响地出了门。我看在眼里,悄悄地跟在父亲身后。

父亲来到了村子小河边。这条小河长年有水流,芦苇丛生,因此有大量鲫鱼。当时正值初冬,寒风刺骨,河面上已经结冰。父亲站在河边,随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小瓶白酒,咕咚咕咚连喝了三口。然后他脱下长裤,穿上一副胶筒靴,将空编织袋别在身后,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敲碎冰块一步一步下到河里,两只手伸进满是冰碴儿的河水里,全神贯注地摸起鱼来。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父亲提着一小袋鲫鱼回来了。他把袋子和鱼放在地上,长舒了一口气,对母亲说:“你和娃儿身子骨弱,刚才村里的张老三给了点鱼,我现在就收拾,给你们熬鱼汤喝。”说完,父亲就做饭去了。

这一小袋鱼,我们全家人吃了将近一个星期。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的眼里泛着晶莹的泪花。

父爱无价

袁宝霞

父亲离开我十多年了。在没有父亲的这段日子里,我很少回想与父亲有关的情景。不是不愿,是不敢,每每忆起,便锥心刺骨。时光飞逝,却带不走对至亲之人的思念。父亲节到了,我又想起了父亲。

父亲生于1937年,高小毕业,写、算、画在村里首屈一指,也算是个文化人。他当过大队会计、大队书记,后来又去乡镇管林业。父亲善良、耿直,当了几十年乡镇干部,一生两袖清风。

小时候,父亲非常疼爱我。当年,父亲经常去县城办事,每次回来总忘不了给我捎袋饼干或糖果,有时也会给我买玩具。所以,父亲每次出远门,我都去村头等他。每次,父亲都不会让我失望。

印象中,父亲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我们村有六个小队,一千多人,大小事都要父亲处理。村民纠纷、两口子打架,都会找我父亲处理,每逢春节,父亲还要给邻居写春联。只有晚上或者阴雨天,父亲才有时间陪我玩。这时,我总要父亲给我画画,父亲画的金鱼、小鸡、小鸭栩栩如生;有时他还用废纸给我折飞机、小提篮、盒子等玩具……父亲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

令我最难忘的是1989年初冬。我

在外地求学期间的一个周末,气温骤降,天上还飘起了雪花。我本来打算周末回家拿棉衣,没想到,父亲突然来了,我又惊又喜,忙问:“爹,这样的天气,你怎么来了?”“天气突变,我和你娘知道你没带棉衣,怕你冷。快穿上吧,别冻着。”父亲一大早冒着风雪骑了十几公里路,坐上公共汽车,下了车,又步行约5公里才到我的学校。看着父亲湿漉漉的棉鞋,我不由得泪眼朦胧。

我参加工作后,父亲经常嘱咐我安心工作,做一名合格的老师。我按照他的吩咐,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工作之余,我每周末都要回家看望父母,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生活得幸福。

天有不测风云。父亲73岁那年患上了肺癌。我永远忘不了2008年腊月初二的早晨,姐姐打来电话,让我回家,我预感父亲会出事。可是当我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了。他走得太突然了,没有等我再和他说一句话,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我号啕大哭。不过他老人家走得很安详,这是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

“子欲养而亲不待”,留给我的是一生的遗憾。世上没有不死的生命,却有永恒的父爱。我会把这份父爱珍藏在心,成为生命的一部分。